



上海的 SHANGHAI BEAUTY 紅顏遺事

陳丹燕 著

「上海三部曲」總序

非虛構的作品「上海三部曲」寫在上海作為中國東海海岸線上最重要的舊通商口岸城市，從將近四十年的沉寂中漸漸醒來之際。我在上海舊法國租界夏季到處都是梧桐樹蔭的街道長大，但第一次理解我們多年失修的老房子，多年疏於照顧的花園不光是頹唐的城區，也是浪漫的城市象徵，竟然是從一個從台北來上海觀光的編輯的指點之下。我記得自己當時陪這位一定要看看張愛玲生活過的城市的編輯，在夜晚的街道上散步，還借給他一輛永久牌自行車，我們一起在安靜的武康路上慢慢騎行，路過漆黑一團的世界小學，那是我練習合唱的地方，也是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高錕上小學的學堂。世界小學旁邊的硤石小路通向了畫家陳逸飛的家。武康路是一條通向南洋公學的舊馬路，追根溯源這條路的來源，就遇見了一位 1887 年來到上海的，名叫福開森的傳教士。

從我學會騎腳踏車的 11 歲起，我有許多機會慢慢騎着一輛舊女式腳踏車，做這樣的城市漫遊，這就是「上海三部曲」的寫作基礎。16 歲左右，我有了自己的第一台單反相機和第一套暗房設備，放相機，切出相紙花邊的切紙機以及相片上光機，拍照和沖曬就是我的愛好。我想這就是「上海三部曲」會用大量照片的緣故。我熱衷於發現照片中被攝影者聚焦時忽視的細節，以及這些自然而然存在的細節闡釋出的，這張相片的意義所在。

當《上海的風花雪月》出版，正遇到了中國開始三十年的城市化進程。作為一個有着廣袤農村的國家，人們對城市的面貌和歷史，在城市生活的人們以及他們的心靈突然有了真實的好奇與興趣，這是「上海三部曲」能保持將近三十年的暢銷和長銷的原因，自然，也是它們的運氣。《上海的金枝玉葉》與《上海的紅顏遺事》兩本傳記也是建立在《上海的風花雪月》的地理範圍裏，只是它們更關注了在那裏生活多年，並在那裏去世的人，那非凡的女人。

中國在飛速發展，上海也在飛速發展，這就是《上海的風花雪月》每過五年，都會在每個章節的末尾補記一篇的原因，這五年裏，每個章節記錄的建築，街道，人物，咖啡館，城市風物，都會有變化，有時候變化來得如此戲劇性，用滄海桑田來形容也不為聳動。讓我吃驚的，還有我寫的上海人物。二十年後，我為《上海的風花雪月》做新的修訂版，突然發現我選擇的人物和新的城市事件，從對歷史的追尋，對老一輩人精神生活的整理和呈現，變為對現狀的記錄，對小一輩人精神面貌的刻畫。以我這樣一個三十年關心這幾個街區的作家，居然也看到了歷史如何向前而去的足印。

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作家最大的運氣了。

今日，「上海三部曲」的香港版即將出版，我一直相信，香港和上海同為口岸城市，心曲必然相通。就像在上海與香港，從來流傳着許多彼此城市與人的故事，這是兩個從未陌生的城市。我願「上海三部曲」在香港獲得它的知音。

陳丹燕

2025年4月 於上海



1974年，經歷了深陷於時代的淤泥與血腥的日子，三十歲的姚姚仍能安靜地坐在親戚家桌前削一隻蘋果，仍能對生活抱有一些美好的想像，仍能面對照相機鏡頭用力地微笑。而這張照片，幾乎是她留在世間最後的幾張照片之一了。



* SHANGHAI BEAUTY *



CONTENTS



目 錄





006- 上海的紅顏遺事

247- 附記
倖存者 1
倖存者 2



「請告訴我一些 1944 年上海夏天的事好嗎？最普通的事，天天都會在生活裏發生的事。」我對一生都在上海度過的老人魏紹昌說。

這是距 1944 年五十六年以後的春天。這天下着雨，室內有着上海雨天淡灰色的天光，屋角的顏色會要深一點，像是紙煙的煙灰，帶着點點斑駁。而窗框的影子在牆壁上變成了一團模糊的斑跡。過不慣多雨的上海春天的人不能體會到那樣的天光裏如煙雲的柔和，於是也很難體會在帶着潮濕雨氣的柔和裏有很輕的感傷。這種綿長的雨，從來不會有人真的知道甚麼時候會停下，也不知道天氣預報裏預報的春雷會甚麼時候來，那將是今年的第一聲春雷。那是一個合適問到 1944 年的天氣。這個老人有很好的記性，他還記得 1932 年日本人炸開北寶山路上上海商務印書館那天的情形。日本炸彈炸毀了當時東亞最大的圖書館和印刷廠，大火在寶山路上熊熊燃燒，被燒毀的紙在 2 月的東北風中向市區漫天飄來，像黑色的雪片，而那其實是四十萬冊中國書，包括近六萬冊的善本書，以及紙庫裏準備印書的紙。黑色的紙灰整整落了一天。南京路上把衣服晾在外面的人家，衣服上落滿了紙灰。他的臉上在說着這樣的事情的時候，有着一種類似微笑的神情，他抬着白髮斑斑的頭。然後，你就會發現那樣的神情原來不是微笑，那是對往事無邊的忍耐。

他對我想知道 1944 年的事有點吃驚。

「是為了寫書呀。我要寫的那個人出生在這一年。」我說。

「想要多知道一點真實的細節，在歷史書，在報紙上，在偉人的傳記和回憶錄裏都看不到的東西，因為我要寫一個普通人。」我說。在我的感覺裏，她的故事就像沾在歷史書上的一粒灰塵一般，但我想做的是，讓她成為一粒永不會被抹去的灰塵。

「是啊。那是需要的。」他說。

1944 年，他是一個二十三歲不到的青年，已經結了婚。他在中一信託公司做職員，雖說是銀行職員，但並不需要在上班時穿西裝，他大多數時候穿長衫上班。

「是灰色的嗎？」我問。

「有時是褐色的。」他想了想說。啊，原來那時的上海青年也穿褐色的長衫。

「1944 年的夏天麼，上海是在淪陷中，在淪陷中。南京西路上的大華電影院裏放的全是日本電影，像轟夕起子、高峰秀子和阪東妻三郎的電影，也演出中國和日本合拍的《鴉片戰爭》，因為當時英國是敵對國。你說滑稽吧。」他告訴我說。

雖然已經有半個多世紀歷史的法國租界，已經消失在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的炮火裏，可按照當年法國人的城市規劃在人行道邊種下的梧桐樹，還在一年年地長高。春夏時，它們綠色的、寬大的樹葉以毫不知情的恣肆拚命地長着，遮蔽了整條整條的街道。冬天，等樹葉變黃，發脆，成批成批地落下，連在夜裏被街燈烤着、最晚落下的那些樹葉也全都掉了以後，能看到樹枝上有一串串淡褐色的小蛋黏在那裏，那是刺毛蟲留下的籽，它是翠綠色的爬蟲，春天時長大，住在梧桐樹上，夏天的時候它把背上的小刺扎到人身上，看不見，可是摸上去，那一塊皮膚讓人痛癢難耐。夏天，從菲律賓海面上生成

的颱風會影響上海，颱風來的時候，大風大雨把它們從樹上掃下來，大人孩子見到了，都恨得用鞋底去碾。它們的體液是黃綠色的，在人行道上小而黏稠的一汪，慢慢乾在陽光裏，在地上留下了黃綠的、微微泛光的顏色，像打翻的毒藥。

梧桐樹下熱鬧或者背靜的街區，仍是上海很貴的地段，仍舊留着孤島時期的浮華之氣。街道兩邊帶花園的歐洲式樣的房子代表着舒適的生活，街道的下水系統很好，所以不像別處那樣，總是濕漉漉的。在那些街區裏，白俄經營的麵包房、照相館、西藥店、芭蕾舞教室和美容沙龍，猶太人開的小珠寶店、皮鞋店和皮草行，還有飯店，法國人開的咖啡館、電影院、教會學校和糖果店，上海人開的舞廳、專營西服的裁縫店、報館、劇團和電影公司，日本文人開的書店，德國醫生開的醫院，仍舊吸引着喜歡西洋式生活的人們，尤其是那些從外面來上海的人。

「那年夏天已經有了紫雪糕賣，白雪公主牌紫雪糕，像一般雪糕一樣厚薄，裏面是冰激凌，外面用巧克力裹着。也有賣棒冰的，赤豆的、綠豆的、奶油的棒冰，有人喜歡在夏天吃棒冰，比較清口。賣棒冰的人把它們放在一個木頭箱子裏，裏面用棉被包着，在沿街賣。他們常常用一個小木塊在木箱子上啪啪地拍。叫賣的聲音和現在一樣，棒冰吃哦，雪糕，就是這種。」魏紹昌老人說。

是啊，我小時候還聽到這樣的聲音，在夏天的五原路上，不過那是「文革」中的事了。賣棒冰的人把木箱子的蓋掀開來，有一種溫和而清涼的氣味散出來，帶着一點點桂花的甜香，因為在綠豆棒冰裏常常加了一點點桂花。那種自製的冰箱沒有冰箱的腥氣。那個人總是很快把箱子蓋上，怕涼氣跑了，棒冰還沒賣完就化了。

「暗殺。」老人說，「街上常常有暗殺的事發生，有時是重慶派來的人暗殺南京政府的漢奸，有時是汪精衛方面的人暗殺共產黨或者重慶方面的人。日本憲兵要捉暗殺的人，就隨時封鎖交通。這時候氣氛馬上就變了，讓人想到那是個亂世。馬路上還有可口可樂招牌，上海已經有了自己的正廣和汽水，那時候叫荷蘭水。用玻璃瓶子裝的。」是那種厚厚的玻璃瓶，發青的顏色。北京人的食品店裏賣酸梅湯，裝在玻璃杯裏。白俄和山東人在從前的霞飛路一起開了一些小小的俄國西菜社，他們供應的色拉和羅宋湯很得上海人的喜歡，色拉是用煮熟以後切成小塊的土豆、煮熟的青豆、切成小方塊的紅腸和蘋果做的，拌了蛋黃醬。羅宋湯則是加了番茄、洋蔥和土豆塊的牛肉湯，很厚。但在俄國生活過許多年的人，卻從來沒有在莫斯科或者聖彼得堡吃到過這樣的俄國菜。它們更像是從四馬路的番菜館廚房裏發明出來的上海西餐。

「晚上有防空警報，汽笛一樣的聲音。聽到警報，大家就要把自己家窗簾拉起來，怕美國飛機來轟炸。」老人說。

這我聽說過的。在上海逃亡的猶太人所學到的上海方言裏，就有一句：「奈電燈隱脫（把電燈關掉）。」過了那麼多年，早已離開上海，從美國又回到維也納定居的杜爾納還記得它。1944年他住在復興西路的一條弄堂裏，弄堂裏的孩子管他叫大鼻子老伯伯。

張愛玲穿着淺紅色的繡花鞋經過靜安寺明黃色的圍牆，她已經是一個很有名的作家了。連年的戰爭，讓許多上海市民習慣了在戰亂中繼續自己的生活，在戰爭中出生長大的孩子，以為那樣的日子，就是日常生活。

7月9日這一天，上海《申報》報道的當日的新聞有：中太平洋

敵艦沉毀達五十餘艘；塞班島日軍繼續展開奮戰；敵機再襲九州，又被從容擊退，日本土防務固若鐵壁；東京等都市決定疏散學童；緬甸富貢前線正展開激戰，日軍精銳摧毀敵企圖；今日防空日訓練，交通音響管制，夜間實施嚴厲燈火管制。

《申報》上的廣告，有高尚人士非 C.P.C. 咖啡不呷；有惠羅公司出售夏季精美用品的廣告，包括了新式電氣冰箱，女士游泳衣，美麗內着衣衫，超等西裝領帶，兒童夏令衣着和優等香水香粉；還有南園咖啡館夏令樂園的告示，它在南洋橋中華路，電話是 70219。那一天，在蘭心劇院上演《武則天》，在國際大戲院上演《王昭君》。中國旅行社劇團在美華上演《茶花女》，而苦幹劇團在巴黎大戲院演出《林冲》。而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清心中學和德大助產士學校都開始招收新生。

這一天，1944 年 7 月 9 日，離霞飛路不遠的一條小街上，一家由外國人開的尚負產科醫院裏，有一個小女孩出生。接生的西醫，用一把醫用消毒剪刀剪斷了女孩子的臍帶後，將它結紮起來，再用消毒方紗布將它包好。

故事就從這個女嬰還沒有張開眼睛的那個時刻開始。一個戰時的炎熱夏天，小嬰兒已經被洗乾淨了，用醫院專門配置給嬰兒用的淡黃色爽身粉在大腿和脖子處撲了一些，保持她身體的乾爽。這是個普通的孩子，她到這個世界上，像風吹起的一粒塵，風把這粒塵吹到了一塊豆腐上，所以我們碰巧就看到了她。我總是想要了解那時的日常生活，那是因為她就在那樣的生活裏。她安靜地躺在漆成白色的小木床上，眼睛真的像桃子那樣腫着，從中間裂開一道長長的小縫，長着嬰孩的睫毛。那是因為在母親的羊水裏泡了九個月的



1944 年 7 月 9 日，姚姚出生在上海尚負產科醫院。

緣故。那天正好是上海市政府規定的防空日，有時會有防空汽笛響，淒厲高亢的聲音，拖着像青衣那樣哭天搶地的長腔，透過用牛皮紙貼了米字格的玻璃窗，響徹了整個房間，但她渾然不覺。

最早照顧小嬰兒的，是一個護士。在遺留下來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她是一個不好看的老姑娘，牙齒有些往外齙，眼睛的表情很溫順，因為分得很開，所以像一隻出生在江南的小羊的臉。動物和人一樣，出生在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長相。她在這個風氣勢利而自由的城市裏受過教育，能說英文，她當了單身職業婦女，得以自食其力，不必受勉強嫁人的侮辱。那個年代要成為可以靠自己獨自生活下去的職業婦女，不是件簡單的事。可在醫院的女醫生、女護士裏，也不算件稀奇的事。她頭上戴着產科醫院的白色護士帽，那漿硬的白帽子，像是一隻精白粉的餛飩。

小女嬰是當時的電影明星上官雲珠的第二個孩子。

上官雲珠是一個嬌小的江南女子，生得非常美，是那種帶着江南小巧玲瓏風格的美麗。十八歲時，她和她的第一任丈夫帶着他們的第一個男孩，隨戰爭難民來到上海。像許多後來在上海出人頭地的人那樣，她當初來上海的原因，只是為了躲進相對安全的租界，住進擁擠的弄堂房子，求個太平而已。然後，機會藏在上海小市民充滿慾望而又實在本分的生活裏，來到她的面前。為了生活，她和上海當時大多數女子一樣要出門工作。她到國泰電影院邊上的何氏照相店去當開票小姐時，名字叫韋均瑩，說了一口長涇話。可何老闆一眼看出了她的俏麗，他帶她走出弄堂，到霞飛路上去買時髦衣服，他把她當成放在店堂裏賞心悅目的花瓶。不知道那一天算不算就是上海給她上的第一課，告訴她在這個城市裏衣服對一個女人的重要

意義。此後，精心打扮就成了她的功課。她總是把自己的大部分收入用在買各種各樣的衣服上，而用來與衣服搭配的首飾，則大多是假的。但皮鞋又是考究的，1948年上海最有名的藍棠皮鞋店開張，她的鞋子就在那裏定做，在藍棠鞋店裏留了自己的腳樣子。而後來小女嬰從五歲到十八歲彈的鋼琴，則是長年租的，家裏也始終沒有買電視。

幾年以後，韋均華成了上海灘上既能演話劇，又能演電影的明星上官雲珠，像有時會在這個充滿機會的都市裏發生的傳奇。她演的第一部戲，據說是一部叫《玫瑰飄零》的粉戲。她演戲認真，渴望成功，為能在當時上海灘的粉戲裏出頭，她對領路人以身體相報。為使自己在鏡頭裏好看一點，她和別的女演員一樣，時不時送時興的領帶、外國香煙和巧克力給攝影師，雖然連攝影師都覺得她沒有必要送東西，可她還是小心翼翼。收工早了，她笑盈盈地陪着同事一起去跳舞、吃消夜，連電影公司打燈光的先生都說她沒有明星派頭。劇團到外地跑碼頭時，次次是她出面在江湖上周旋，讓戲能一天天演下去。她是一個真正敬業的演員，為了能演到戲，可以付出一切。演到弱女人的辛酸時，她曾在片場上放聲痛哭，失去了控制。這便是上海式的傳奇，當一堆沙子變成了金子時，誰都知道它們經過了怎樣的烈火。那天，片場的戲因為上官雲珠的失態拍不下去了，導演很是奇怪上官雲珠的脆弱。還是黃宗英過來勸道：「小心把臉上的妝沖壞了。」那時候，受過教育、思想「左傾」、活躍在上海「左派」藝沖家圈子裏的黃宗英是看輕從底層掙扎出來的上官雲珠的，可她還是說出了最體己的話。

許多年後，我遇見過一個非常想要出人頭地的女子，獨自一人到

上海來。自然她是吃了許多苦。有一次她告訴我說，有時她忍不住哭了，就將臉仰平，像點眼藥水那樣，把眼淚控制在眼眶裏：「把臉上的妝沖壞了，更沒人要看你！」她說。我不知道那一次在片場，上官雲珠是怎樣做的。她會像那個女子一樣將臉平平地揚起，來控制眼淚嗎？她會像點眼藥水那樣讓眼淚倒流回去，保護自己臉上的化妝嗎？聽說後來，她為自己的失態，專門請導演到家裏吃飯，但絕口不談為甚麼就這樣哭了。

她的眉眼十分俏麗，還有合乎江南人審美的精巧的小嘴。要是把眉毛拔細了，高高挑上去，尖尖的下巴抵在旗袍滾金絲邊的硬領子上，就會有上海美女的精明世故的樣子，在那裏面帶着一點點風塵氣的冶豔和江南小家碧玉的本分。所以她常常被導演選去演上海的交際花，商人家庭的少奶奶，暴發戶張狂的妻子。在細細畫眉下，她機靈的眼睛，會表現出像最鋒利的刮鬍子刀片一樣的刻薄，她嘴邊的淺笑，表達了聰明而世故的都市女子沒有絲毫粉飾的直率內心，所以她能演張愛玲的《太太萬歲》，在上海租界的弄堂女子故事中物我兩忘。要是洗掉鉛華，把電燙的頭髮用頭油抿直了，她的臉上就會出現像青草一樣的無辜和無告，在她顴骨下的陰影裏，有着慘淡和驚惶。那樣的陰影，讓人猜想一個從沉悶江南小鎮上來的美女，沒有靠山，也不是洋學生，靠自己，沉浮在上海弱肉強食的名利場，被緊緊埋在心裏的那些事。她也演孤苦的女子，演被強姦的女工，走投無路的丫頭，在被碾碎的命運裏軟弱地掙扎。

1944年，她已經被人稱為明星了，但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看得懂在粗糙的劇本和閃爍跳動的影像裏這個女演員表演的光芒？像在尋常木頭匣子上草草地嵌了一顆鑽石，她總是閃爍着與周遭不甚般配



姚姚的媽媽上官雲珠 (左) 在電影《太太萬歲》中。

的奪目光彩。她也明白自己真正的才華被當時的上海電影浪費嗎？是因為這樣，她才常常不顧一切地找能讓自己大放光彩的機會嗎？這種心願常常看起來像是一些別的東西，比如，想要像胡蝶那樣傾城，想要過大明星奢侈的日子。特別是在上海這樣浮華的地方，得意的人生裏總是被物質和虛榮點綴着，讓人輕易說不明白它們之間的不同。

這時，她已經離開了當初落腳的蒲石路 236 弄 18 號，離開那閣樓裏住着的結髮丈夫和第一個兒子，與在上海演劇界名聲響亮的人結婚。他們在法租界的永康別墅裏安了家，浴室裏的銅龍頭上，放

出冷水的那一隻，在龍頭把手中央嵌着的一小塊白瓷上，寫着一個 C。熱水龍頭的白瓷上，寫着一個 H。她的大衣櫥裏掛滿了各種各樣的旗袍和配旗袍用的披肩、短袖開衫、手袋、繡花鞋和玻璃絲襪，還有自製的繡褲。那時候還沒有拉鏈，繡褲上縫着一長排扣子和搭襻，用來收緊腰身，保持苗條。有時候衣服穿了一次兩次還沒送出去洗，在衣櫥裏掛着，染得櫥子裏也有粉餅澀澀的香氣。有時候在粉餅的香氣裏，還浮着白蘭花清澈的濃香，也許因為在初夏的時候，她曾在旗袍的盤紐上掛過用細鉛絲穿起來、像扇子一樣排開的白色小花。賣花女人挽着一個扁竹籃，站在街角，看到穿戴整齊的女人走來，就叫一聲：「白蘭花味梔子花。」那氣味複雜的衣櫥裏，是一個 1944 年的上海電影明星一定要用的行頭，特別是像上官雲珠這樣一個逃難來的小鎮美女，在名利場中掙扎着發跡的人。

小女孩的父親，是留洋回來的文人姚克。他是一個倜儻的蘇州人，頭髮用髮蠟梳得光光的，一小縷一小縷的，留着梳子的齒痕，穿白色西裝和牙籤條的薄呢背心，在說話裏夾着一些英文字。他回國的時候，帶回來一個美國妻子。法國公園邊上的法國總會樓上，有一個雅緻的小禮堂，上海大學裏「左傾」的學生們常借那裏演英文戲，地下黨的人去那裏看戲，他也帶着太太一起去看戲。他在當時全國唯一的一家英文雜誌《天下》做主要作者和編輯。在魯迅著作的翻譯上，他出了許多力，和魯迅來往密切。到魯迅病逝，在萬國殯儀館大殮，按照西方摯友和至親抬棺木的習慣，魯迅的棺木也由他生前最密切的弟子來抬。而姚克就是那十個抬靈者中的一個。可他的好朋友劉半農，多愁善感的《叫我如何不想她》的作者，則是魯迅雜文譏諷的對象，但他的另一個好朋友殷夫，是被國民黨在龍華處決



姚姚的父母姚克與上官雲珠。

了的作家。他就是這樣一個在上海很活躍的知識分子，自我感覺良好，整天想着折騰自己喜歡的事，不算紅色這一邊的，也不算白色那一邊的，他不想，他們也都不要他。因為他舉止的西化，曾經被思想進步的導演和小報記者叫做「洋場惡少」，他聽了，委屈地告訴當時在上海演戲的黃宗江，比他小了十幾歲的黃宗江沒大沒小地拍他肩膀，安慰他說：「你哪裏是洋場惡少，姚 Sir，你是大大的洋場良少。」

他沒有像大多數留洋回來的人那樣，去大學裏當教授，而是泡在苦幹劇團裏當編劇，寫古裝戲，同時也導戲，聽說他當年的名氣不在黃佐臨之下。在日本人監視下，藝人們不願意不演戲，又不能演現實生活的真相，也不願意當漢奸演員，古裝戲就成了藝人們的最後一條鋼絲，不知有多少人在古裝戲裏鍛煉着自己的藝術，安慰着自己的理想。姚克的《清宮怨》就是那時候寫的，那裏面委婉的悲情一下子吸引了留在上海最有名的演員和導演，上官雲珠在裏面演一個宮女。他們就是天風劇社排練場裏認識的。1942年，他的美國妻子帶着孩子回國，姚克和上官雲珠在北京結婚。

這個小女孩就出生在這樣的一個城市，這樣的一些人中間，像一滴清水落進鹹鹹的大海。她的乳名叫「寶貝」，可叫她的人，用的是英文裏「貝貝」的調子。大家「寶貝，寶貝」地叫着，像是說一句洋涇浜英文。許多年以後，當她四周的親人像水中的木船被大風吹翻，被大浪打爛，連一塊木板都不曾剩下，她獨自住的這個到處留着她的傷心事的城市裏，那些梧桐樹深深的街區，就是她手裏的最後一點木屑，它們不能救她，可是，給了她安慰，讓她抵死不肯離開。

到寶貝離開醫院的時候，那個護士小姐辭去工作，跟孩子一起回到上官的家，成為專門照顧寶貝的保姆，她也照顧上官的起居，上官雲珠叫她秘書。

「寶貝，快把雞蛋吃掉，冷了就腥氣，更難吃了。」

「寶貝，該去彈琴了，媽媽回來要聽的。」

家裏的傭人總是這樣招呼她。六歲的時候，她快要上小學了。有了一個正式的名字：姚姚。她仍舊跟着姚克姓，用爸爸給她起的名字。那時，她梳着一對細細的小辮子，有一點默默的，不像一般小



姚姚是家教嚴格的上海女孩。

姑娘那樣活潑。有時候，抱着她的娃娃，在家裏走來走去。書架上所有的書都小心翼翼地緊挨着，沒有一本留在桌子上。紅木圓桌的鏤空雕花裏，也沒有一點點灰，保姆總是用抹布穿到那些小洞洞裏，拉住抹布的兩頭，來回蹭上幾次，讓一點灰也藏不住。那是上官家的規矩。可要是夏天，沒有男賓的時候，家裏的女人們可以穿得很



上官雲珠和姚姚一起出演電影《三毛流浪記》。

少，像長涇女人過夏天一樣。小女孩的布娃娃有一張賽璐璐的圓臉，那是 1950 年代初的新式娃娃，大多數小女孩子都沒有玩過這樣的娃娃，因為它很貴。姚姚很喜歡那個娃娃，到照相館去照相，特地要帶上它。上官雲珠並不常常在家，排戲的時候，常常回來很晚，並沒有